

英国宗教极端化问题及“去极端化”措施研究*

安高乐[◎]

内容提要: 自 2005 年英国地铁爆炸案以来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一直是英国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宗教极端主义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原因,其过程包括信仰危机—渐进灌输—担任新角色—走向极端化四个阶段。英国为此采取了以预防、追踪、保护与准备为主的“去极端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关键词: 伊斯兰解放党 穆哈吉伦 社会运动 追捕计划 疏导计划

作者简介: 安高乐,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伦敦地铁爆炸案以来英国宗教极端主义日益凸显,并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本文拟从英国极端组织及危害、极端化的过程和原因、去极端化措施的成效及缺陷等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英国主要的宗教极端组织及危害

“9·11”事件后英国面临一系列恐怖威胁,其中最严重的威胁是来自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受暴力伊斯兰教鼓舞的其他极端组织。^① 根据 2012 年英国下议院的报告估计,英国大约有 62 个国际恐怖组织,^② 其主要极端组织及其危害论述如下。

(一) 宗教极端组织或运动

1. “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

该组织由巴勒斯坦人塔基·乃布哈尼(Taki al-Din Nabhani) 1952 年在东耶路撒冷成立,总部现设在伦敦,旨在解放巴勒斯坦并重建已被摧毁的哈里发。“伊斯兰解放党”是一种跨国运动,在包括西欧的世界范围内招募成员和支持者。^③ 其活动波及土耳其、俄罗斯、中亚以及欧洲、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

2. “穆哈吉伦”(Al-Muhajiroun, AM)

该组织的领导人奥马尔·巴克里(mar Bakri Mohammed)起初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成员,脱离伊斯兰解放党后于 1996 年在英国创立“穆哈吉伦”组织。“9·11”事件后,“穆哈吉伦”支持使用暴力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地方建立伊斯兰国家。“穆哈吉伦”极端分子鼓励英国人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抗击美国,发表声明支持在伊拉克针对联军发动圣战。^④ 奥马尔·巴克里和其他头目发表声明支持对美国在非洲大使馆的袭击,威胁暗杀英国首相梅杰。^⑤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国际社会中去极端化模式比较研究”(课题号:17BGJ066)的阶段性成果。

① Prevent Strategy, HM Government, June 2011, p. 13.

② House of Commons, “Roots of violent radicalisation,” February of 2012, p.33.

③ I.Volf, “Hizb ut-Tahrir in the pres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what made the group newsworthy in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Kyrgyzstan in 2002–07,” In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 No.2012, p.1.

④ Quintan Wiktorowicz, “The Rationality of Radical Isla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1, No. 2, Summer of 2006, pp. 303–304.

⑤ Quintan Wiktorowicz, “The Rationality of Radical Isla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1, No. 2, Summer of 2006, p. 303.

3. “迪奥班迪主义运动”(Deobandism)

该组织起初是印度穆斯林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成立的逊尼派伊斯兰运动,创始人是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卡西姆(Muhammad Qasim Nanautawi)。“迪奥班迪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迁到英国,并在整个英国设有清真寺网络伊斯兰神学院(daru' l-ulum)。据报道,该运动的主要头目利雅得·哈克(Riyadh ul Haq)2007年敦促穆斯林拒绝西方价值观并要求从非穆斯林社区分离出来,宣扬反犹太主义、敦促穆斯林支持武装“圣战”、称赞塔利班。^①

4. “伊斯兰教义支持者”(Supporters of Sharia, SOS)

该组织于1994年由阿布·哈姆扎·马斯里(Abu Hamza al-Masri)创建,其成员包括参与阿富汗波斯尼亚“圣战”的战士,公开声明通过“圣战”来捍卫伊斯兰教法并重建哈里发,其议程包括与西方社会作斗争并建立伊斯兰教国家,鼓励穆斯林不要融入英国社会。^②

(二) 宗教极端组织的危害

1. 给社会造成恐惧心理

造成人员伤亡是恐怖主义袭击对国家的直接危害。恐怖主义是极端主义付诸行动的表现,恐怖主义者在“9·11”事件后对英国发动无数次暴恐袭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危害,同时在精神上给英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惧感。

2. 破坏经济成果和经济建设

恐怖主义组织给相关国家造成政治动荡和经济损失,当恐怖主义破坏经济社会稳定时,“反恐”成本会持续增加。恐怖主义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经济,直接损害是指破坏经济成果和经济建设,间接损害与经济主体(例如,消费者、外国投资者和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有关。恐怖袭击除了造成直接的巨大经济破坏外,还会影响英国旅游业的后续经济收入。另外,英国政府为了避免遭受恐怖袭击,不得不将公共资源转移到提供安全保障上,转移引起的费用与恐怖主义施加的恐惧心理密切相关。^③最后,恐怖主义导致流入英国的外国投资减少。

3. 降低生活的满意度

最难衡量的成本是可能的恐怖袭击造成的心理成本。弗雷(Frey)等人使用生活满意度测评法(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LSA)来衡量构成恐怖主义代价的“恐惧、悲伤和哀悼”。他们提出一个假设:适当控制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区域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将差异归因于恐怖主义袭击后,一个容易发生恐怖袭击地区的生活满意度通常低于一个和平地区。在提出假设后,作者在英国进行了30,244份问卷调查。为了进行横向比较,作者也从爱尔兰、北爱尔兰和法国进行同样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恐怖主义在所有情况下都会降低生活满意度。^④

二、英国伊斯兰极端化的过程和原因

对英国伊斯兰极端化过程和原因的理论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的“社会运动理论”

① Anna Wojtowicz,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the UK: Index of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p.60.

② Anna Wojtowicz,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the UK: Index of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p.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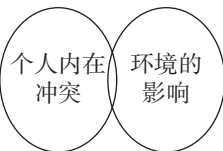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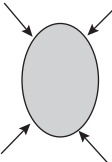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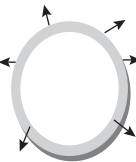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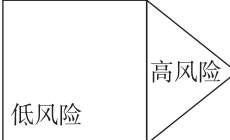
③ Tim Kriege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m for the European Un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EI-SWP conference, January 2019, p.7.

④ Walter Enders, “Measuring the Economic Costs of Terroris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inance and Legal Studies Culverhouse College of Commerce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y of Alabama, p.26.

(Social Movement Theory, SMT) 把社会运动及其暴力群体视为受议程和一系列明确目标驱动的理性参与者。SMT 称, 社交网络发挥传递不满、招募和动员的重要工具。安雅·达尔加德·尼尔森 (Anja Dalgaard-Nielsen) 认为 SMT 包含三个原理: 应变原理、资源动员原理和框架原理。^①

应变原理通常关注社会内部和外部压力, 这些压力会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在民众中产生一种孤立和无助的感觉。资源动员原理解释如何开展运动、获得并扩大其支持者, 社交网络和微观组织 (例如清真寺、学校和宗教组织) 如何界定和传播不满。框架原理侧重于有意义的社会生产和传播, 以及个人如何将自己概念化为集体。将三者结合起来, 这些原理为理解英国伊斯兰极端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因此, 本文运用社会运动理论的三个原理将过程和动因结合起来分析。就英国伊斯兰极端化的过程而言, 其产生经历四个阶段: 信仰危机—渐进灌输—担任新角色—走向极端化。应变原理有助于解释国内的不满和国际困境如何造成永久性危机; 资源动员理论描述极端化三个阶段所涉及的机制; 框架原理解释整个过程中的人际交流过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极端化路径的模型

	信仰危机阶段	渐进灌输阶段	承担新的角色阶段	极端化阶段
过程	 <p>人口</p>			
原因 细节	个人内心冲突: 被排斥感 价值观冲突 环境的影响 阿富汗战争 = 穆斯林可以击败 超级大国 海湾战争 = 对圣地的威胁 伊拉克战争 = 对穆斯林的战争 通过行动主义进行社会宣传	意识形态语境化 社交 / 个人联系 资源调动 建立关系 思想情景化 运用推理类比	选择激励 社会活动 接受极端意识形态 建立招募网架	低风险行动主义 低风险为高风险极端化铺平了道路 高风险行动主义 高潮 进一步群集 团体思考是极端思想的力量倍增器

资料来源: 雷汉·穆斯塔克:《英国穆斯林社区的“去极端化”》, 海军研究生院, 第 37 页。

(一) 信仰危机阶段

1. 英国穆斯林疏离社会的主要原因

首先, 被排斥感使穆斯林普遍认为其不被社会接受。根据雷汉·穆斯塔克 (Rehan Mushtaq) 2002 年的一项调查, 有 69% 的穆斯林认为, 自己并不被看作英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在“9·11”事件后情况变得更糟。在“9·11”袭击发生后不久, 有 57%

^① Anja Dalgaard Nielsen, “Studying Violent Radicalization in Europe I -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Working Paper for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2, p.4.

的人表示与非穆斯林的关系已经恶化;“9·11”袭击一年多以后的测评显示 37%的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同情程度有所下降。^① 正如昆坦·维克托罗维奇(Quintan Wiktorowicz)所说,这种感觉不是社区敏感的产物,自袭击以来,确实有 84%的非穆斯林对穆斯林更加怀疑。^②

其次,价值冲突引起。阿拉姆(M. Y. Alam)在他的《布拉德福德制造》一书中将这种张力归因于西方世俗主义与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竞争,这使英国的年轻穆斯林陷入其父母的信仰与东道国价值观的冲突之中。^③ 在涉及赌博、酗酒、投资、通奸、同性恋和亵渎等问题时,英国的世俗法律经常与穆斯林的宗教原则冲突。正如阿拉姆指出,协调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对英国社会是一项重大挑战。^④

2. 环境的影响

(1) 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

英国穆斯林极端主义的产生始于阿富汗“圣战”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开始招募阿富汗“圣战”组织成员,1989年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圣战分子回国后被视作当地的英雄。他们没有融入社会,而是仍然致力于传播他们的“宗教理想主义”,直到形势严重后英国政府才予以重视。

(2) 海湾战争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初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批评,但美国及其盟国与伊拉克的战争爆发后,萨达姆因发动战争而受到赞誉,因为在穆斯林看来,他敢于直接挑战西方。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因支持美国而被阿拉伯世界认为“背叛”了伊斯兰的荣誉。

(3) 伊拉克战争

美国在伊拉克发动战争源于萨达姆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将其转移给恐怖分子带来的危险,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发动了战争。^⑤ 但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合法性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为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确凿”情报的英国政府也难辞其咎。^⑥ 英国“伊斯兰解放党”和其他极端组织利用以上事件发动社会宣传活动、推动极端伊斯兰运动。极端主义活动者充分利用了环境,并利用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来结识新朋友,然后在讨论和互动中萌发了危机感。

(二) 渐进灌输阶段

1. 建立关系

极端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新的个人纽带。伊斯兰主义者非常讲究策略,在没有建立信任之前组织者不急于改变新来者的思想,而是随意交谈、慢慢开始,目的是了解目标个体的特殊关切。一旦获得目标个体的信任,组织者就可以开启灌输之路。

2. 思想情景化

只有个体开始接触运动并显出最初的兴趣,他们才会被说服并慢慢接受洗脑。像其他社

① Rehan Mushtaq, “De-Radicalization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U.K.,” Master’s Thesis of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June 2009, p.41.

② Quintan Wiktorowicz, *Radical Islam Rising: Muslim Extremism in the West*,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89.

③ Alam, *Made in Bradford*, Route Publishing, Nov.8th, 2006 p.1.

④ Wiktorowicz, *Radical Islam Rising: Muslim Extremism in the Wes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July 21st, 2005, p.89.

⑤ Kimberly Marten, “Is Stability the Answer?” in Chester A. Crocker (ed.), *Leashing the Dogs of 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p.633.

⑥ Lieutenant Colonel John J. Hickey Jr. “In the Aftermath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European Support for GWOT,” in William Murray (ed.)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GWOT*, U.S. Army War College, Pennsylvania, September, 2006 p.198.

会运动一样，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倡一系列挑战主流文化规范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教导穆斯林如何摆脱主流解释，同时提出自己的理解。由此产生的“志同道合的网络”是共同身份的基础，该网络经常以上帝的名义发动极端活动。极端主义领头者为确保其命令被接受，宣称遵守任何一种世俗法律都是叛教行为。^①

（三）担任新角色

1. 选择性激励

在这一阶段，个人逐渐受到灌输并成为坚定的活动者。积极活动者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并在运动中找到目标。除宗教灌输外，积极活动者还参加各种公共宣传活动，并认为参与这些活动为其提供激励机制。成员每周至少会举办一次公共学习活动，该活动在当地清真寺和运动通讯中做广告，旨在传播思想并吸引新成员。

2. 建构解释性框架

大卫·斯诺（David Snow）认为，框架可以指导行动，通过框架解释使事件变得更为重要。^② 但是，只有当个人与运动之间存在“框架一致性”时，才有可能招募和动员，运动的方案只有与个人的解释框架产生共鸣才能促进参与。为了实现最佳的“框架一致性”，伊斯兰主义活动家不但要求其成员了解穆斯林活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而且掌握社会和政治问题。^③ 因此，成员对“反恐”战争、伊拉克局势以及以巴冲突等与穆斯林有关的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四）走向极端化

1. 低风险活动

低风险活动是指容易走向极端化前期的“脆弱”过程。大多数从事低风险行动主义的活动以年轻人为主，因为年轻人有理想、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世界，此外年轻人的智力和心理处在发育阶段，更容易操纵和走向极端化。

2. 高风险活动

与其他阶段（可能会渐进发生）不同，从低风险向高风险行动转变可能是一个迅速的过程，也是建立极端组织和大量集群的阶段。这些大量集群对于逐步发展为高风险的行动至关重要，而这一阶段以参与恐怖活动为最终目标。“团体思考”是指导团体实施恐怖活动的最大动力，是极端思想的力量倍增器，同时在小组成员之间为“谁是最极端的人创造了竞争环境”。^④ 一旦行动成为集体目标，则该集群中的每个成员都将接受挑战，接受“圣战”组织的任务，并给自己披上“圣战”战士的“合法”外衣。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行为是个人参加“圣战”的一项内部决定，并且个人要秘密签名。

三、英国“去极端化”措施的成效及缺陷

（一）英国“去极端化”措施

英国政府为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而采取各种反制措施，2003年英国提出第一个综合反恐战略，称为“竞赛”战略1（CONTEST-1）。2009年“竞赛”战略1经过修改后成为“竞赛”

① Mushtaq, “De-Radicalization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U.K.,” Master’s Thesis of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June 2009, p.43.

② 同上。

③ Robert D. Benford &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000) pp.619-622.

④ Silber &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p.9.

战略2 (CONTEST-2)。2011年7月,英国政府又发布了“竞赛”战略的第三版。这套战略包括四步计划,即“四个P”:预防(prevent),追踪(pursue),保护(protect)和准备(prepare)。^①

1. 预防计划(prevent)

预防的目的是保护和支持弱势群体,以防止其成为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预防工作还扩展到支持涉恐活动者的康复和脱离接触计划;预防工作也保护民众免遭黑帮、毒品滥用的影响。预防计划取决于与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公共机构(包括地方当局、学校、卫生组织、警察、监狱)以及私营部门的广泛合作。预防计划的执行模式包括三个阶梯(见图1):基础层级是根除极端化的诱因;中间层级在于通过早期干预来保护和支持脆弱者(极易走向极端化的人),避免其走向极端化;第三层级主要通过康复计划使涉恐分子脱离接触并抛弃极端化意识形态。预防计划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疏导计划”(Channel Program)是预防计划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主要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阻止极易走向极端化的个体走向极端化。^②“疏导计划”要求疏导者努力在“脆弱者”参与暴力或恐怖主义行为之前的关键时刻与其进行接触并进行预防性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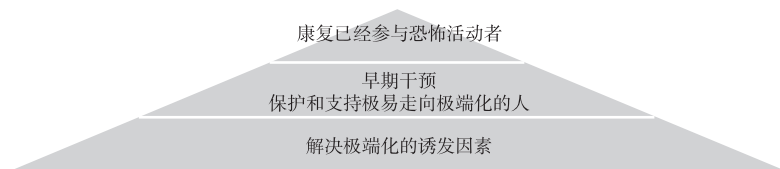


图1 预防计划模式

资料来源:《英国“反恐”战略》,2018年6月。

2. 追踪(Pursue)计划

追踪的目标是发现并掌握恐怖活动,调查恐怖活动以及遏阻恐怖主义活动。该项工作的计划需要“反恐”警务、安全与情报机构以及武装部队之间的密切合作关才能取得成功。英国已建立并继续加强以本土为基地“反恐”网络,以便调查恐怖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在《2015年战略防御和安全评估》(SDSR)计划出台之后,英国进一步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以继续确保拥有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转变所需的资源。为了落实SDSR计划,英国已在安全和情报机构“反恐”能力建设上投资14亿英镑。这笔投入可以支持招募1900名司法官,以支持英国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为了应对威胁的最新变化,2018年对恐怖活动的积极调查案件同比增加了30%;为了应付伦敦和曼彻斯特免遭恐怖袭击,政府在2017/18年度“反恐”警务机构提供高达2800万英镑的资金,在2018/19年度额外拨款5000万英镑。^③

3. “保护计划”(protect)

保护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加强本土和海外利益的保护措施,使英国免于恐怖主义的袭击,确保公共安全,从而减少英国的脆弱性;为了防御攻击、减少恐怖主义者非法获取作案物资

① Paul Murphy, “Report into the London Terrorist Attacks on 7 July 2005,”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May 2006, p. 5.

② Talene Bilazarian,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Lessons on Early Intervent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s Channel Program,”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ctober 2016, p.3.

③ “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June 2018, p.43.

而建立有效的多层防御措施，同时还保护英国最容易受攻击的公共场所，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保护的目标包括：（1）在边界探测并应对可疑的恐怖分子和有害物资；（2）降低风险、改善易受攻击的国际航空、关键基础设施和其他交通部门；（3）减少拥挤地特定弱势群体和精英群体的脆弱性；（4）探测和阻止恐怖分子获取涉恐物资、知识和信息的渠道。

4. “准备计划”（Prepare）

准备计划的目的是在发生恐怖袭击时挽救生命、减少伤害并迅速恢复健康，这包括确保英国有快速的反应来终止任何攻击，尽量减少对本地社区和受攻击社区的影响，并在英国各地作出有效、快速和协调的反应。准备的目标可概括为三点：（1）对所有类型的恐怖袭击采取协调一致的多机构应对措施；（2）确保英国具有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全面能力；（3）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袭击对人员和社区的影响。

（二）英国“去极端化”措施的成效及批评

英国自2003年期开始实施以“去极端化”为主的“竞赛”战略，到目前为止已逾17年之久，“去极端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一些批评。“预防计划”取得的成效包括：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减少脆弱群体走向极端主义的项目；从2010年2月到2018年，从互联网上删除超过30万条恐怖主义者发布的消息；自2012年到2018年，通过“疏导计划”为1,000多名高危人群（极易走向极端化者）提供了支持；完成一百多万次预防培训；自2015年到2018年，成功劝说大约100名儿童放弃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地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①通过“疏导”计划，政府聘请心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宗教专家对成千上万名被认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者进行说服教育。

“保护计划”使英国拥有保护民众和场所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的世界领先的水平。在边境，英国开发并使用生物识别签证，提前对旅客信息进行识别，以防止涉恐个人混入英国。对从公共旅行区（CTA）以外到达边境的乘客进行100%检查，以便找出与任何犯罪、安全和移民有关的问题。所有执法机构间密切合作，并有权通过《2000年恐怖主义法》附件7进行干预。^②在国外，英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共同确保和提高机场的安全标准，并不断评估这些安全措施。武装部队在英国的航空安全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射拦截系统，以拦截危害英国领空的任何身份不明或未经授权的飞机。2017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为了增加“国家保障资产”（National Barrier Asset, NBA）计划，政府向警方提供了额外资金。

“追踪计划”让“反恐”警务和安全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各种战术和技术能力来破坏恐怖活动，包括对个人秘密信息监视，审查资产和合法的通信拦截。除了这些措施外，英国还使用多种方法来限制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例如禁止恐怖组织的活动、冻结和没收其金融资产、并捣毁监狱中的恐怖主义网络和团体。

“准备计划”实施后，紧急服务机构已具备训练有素的专家来处理恐怖事件，包括由专业警察和救护队支持的武装警察。训练有素的专家拥有技术和装备来应对使用化学、生物、放射或核装置来发动的袭击。这些专家曾于2017年恐怖袭击时赶到事发现场，并在几分钟内迅速对恐怖袭击事件采取应对措施。2018年，专家利用其专业的化学知识来应对索尔兹伯里的

① “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June 2018, p.31.

② “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June 2018, p.54.

恐袭事件。^① 紧急服务机构也与“地方弹性论坛”(LRF)紧密合作,将地方合作伙伴整合在一起,为地方性事件和大规模紧急事件进行规划和准备。

但是英国的“去极端化”措施也遭致许多批评之声。评估英国“预防”战略的其中一个指标是看它是否阻止伊斯兰主义者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支持“伊斯兰国”,从这方面来看,英国的“预防”战略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正如军情五局的前任局长伊丽莎白·曼宁厄姆·布勒男爵夫人在2015年指出,“如果‘预防’战略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有效的話,就不会有那么多英国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战斗。”^② 政府2016年发布的“竞赛战略”年度报告指出,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总共有850名“危险分子”人员从英国前往该地。^③

另一个问题是错误地推荐到“疏导计划”的比例很高,这引发了严重的问题。根据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披露的数据,从2007年4月到2014年3月31日,向疏导计划推荐的总数为3,934人,其中只有约20%被多边评估小组评估为“脆弱者”进入疏导程序。^④ 最后,由于该计划执行以来针对穆斯林的比例过高,因而被批评为是针对穆斯林社区的监视。^⑤

四、结语

英国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既有国内原因又有国际原因,从国内因素来看,国内穆斯林因为感到被剥夺和边缘化等社会问题,大多数新成员,特别是第二代和第三代英国穆斯林被动支持或参加恐怖主义活动;从外交政策来看,穆斯林不满英国政府对国外穆斯林遭受的压迫熟视无睹的立场。极端化的形成过程包括信仰危机—渐进灌输—担任新角色—走向极端化四个阶段。针对极端化的危害,英国实施了被称为“竞赛”战略的“去极端化措施”,包括“预防计划”“追踪计划”“保护计划”和“准备计划”,其中“预防计划”中的“疏导”计划旨在阻止“脆弱者”走向极端化。4P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因“疏导”计划误推一部分“极易极端化者”而备受批评。此外,英国的“去极端化”措施也未能阻止一部分极端主义者前往中东参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英国政府需对“去极端化”措施进行阶段性评估,以期因势利导,对存在的不足方面进行改进。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June 2018, p.63.

② Baroness Elizabeth Manningham-Buller, “debate on the Counterterrorism and Security Bill,” 13 January 201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Lords/2015-01-13/debates/15011360000366/Counter-TerrorismAndSecurityBill?highlight=Manningham%20Buller#contribution-15011360000177>.

③ Amrit Singh “Eroding Trust The UK’s Prevent Counter-Extremism Strategy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6,p.107.

④ Amrit Singh “Eroding Trust: The UK’s Prevent Counter-Extremism Strategy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2016, p.107.

⑤ Gabriel Hoefl, “Soft!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 An Explor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Spring 2015, p.46.